

试论科技创新与反垄断法的冲突及协调

干潇露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

摘要:近十年来,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造就了一批信息产业巨头,但让这些大企业困惑的是:他们通过创新取得了成就,却频频触动“垄断”的高压线。科技创新似乎与反垄断法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给反垄断法“维护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价值目标带来了冲击。缓解这种矛盾有三种途径:明确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是保护竞争,广泛适用合理原则,以及慎用剥离制度。提出中国应对科技革命,反垄断立法及执法。

关键词:科技创新;反垄断法;合理原则;剥离制度

中图分类号: DF 4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2-0017-07

On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nti-monopoly Law

GAN Xiao-lu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ten years, the fast-going information revolution has triggered the emergence of plenty giants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However, what makes those giants confused is tha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ir innovation always break the bottom line of monopoly. There seem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nti-monopoly law, of which the fundamental conflict has an impact on the basic goal of anti-monopoly law, that is, to maintai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otect consumers' interests. In order to ease such contradiction, three approaches shall be adopted: 1) to ensure that the basic value of anti-monopoly law is to protect competition; 2) to apply widely the “rule of reason” of anti-monopoly law; and 3) to employ reasonably the divestiture mechanism. On such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f legislating and enforcing anti-monopoly law in China to tackle with technology revolution.

Key words: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ti-monopoly law; rule of reason; divestiture mechanism*

收稿日期: 2011-11-17

基金项目: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化产业竞争秩序规制研究——以竞争法的适用为视角”(10YJA8201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干潇露(1987-),女,浙江上虞人,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竞争法。

一、引言:风起云涌的科技巨头垄断案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信息产业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也造就了一批拥有高新技术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巨人”企业。这些企业所创造的新技术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扩大了企业规模,也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让这些企业感到困惑的是,一方面国家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当他们通过创新使企业发展壮大后,国家却常常以垄断之名遏制企业的发展。近十年来,微软、苹果、英特尔、谷歌、AT&T等信息产业巨头频频触动“垄断”的高压线,反垄断执法机关也似乎总倾向于向这些企业开刀,而其中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案件当属1998年以来的微软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2005年AMD公司起诉英特尔集团垄断案,以及2010年以来的谷歌操纵搜索排名、排挤竞争对手案。

1. 微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1998年,美国联邦政府向法院提起诉讼,指称微软公司的商业行为限制市场竞争,违反了《谢尔曼法》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经过大量事实的调查,2000年7月杰克逊法官以微软公司滥用其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垄断地位为由做出最终判决,判定微软违反《谢尔曼法》及各州反托拉斯法的相关条款,并做出了将其剥离为操作系统公司 and 应用软件公司的裁决^[1]。微软不服初审裁决提起上诉。2001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裁决,躲过被分拆的厄运。最终微软与司法部达成一致的救济意见,即微软同意个人电脑制造商可以自由选择视窗桌面,公开部分视窗软件源代码,使其他竞争者也可以在操作系统上编写程序。

然而,美国政府诉微软公司案的终结并没有使微软松一口气,在将近十年里,微软在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频频遭到反垄断指控和调

查,这无疑是对微软公司快速发展的一种牵制。2004年,欧洲法院要求微软剥离其视窗操作系统中的多媒体播放软件,开放软件源代码。在微软拒绝执行此等裁决的情况下,欧洲法院做出了处罚微软4.97亿欧元罚金的裁决^[2]。同年,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JFTC)指控微软与日本PC销售商签订的许可销售协议中的“不行使专利”条款违反了日本《禁止垄断法》中关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规定,要求微软在许可协议中删除该条款^[3]。2006年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在认定微软在韩国的三项捆绑销售行为(包括视窗多媒体软件与视窗服务操作系统、视窗播放器、即时通讯工具与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捆绑)之后,向微软发出了停止捆绑行为以及处以相当于3100美元罚款的裁决^[4]。

2. AMD诉英特尔垄断案

2004年AMD公司向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局和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JFTC)提交了对英特尔公司的诉讼,指控其违反了《欧共体条约》第82条(现第102条)及日本《禁止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2005年AMD向美国特拉华州地区法院提起了反垄断诉讼,指控英特尔在世界范围内与客户签订各种形式的排他性交易协议,逼迫客户不与AMD进行交易,非法维持英特尔在X86微处理器市场的垄断地位。2006年,AMD又向德国联邦卡特尔办公室投诉了英特尔,指称英特尔与Media-Saturn Holding GmbH公司签订了排他性交易协议,将AMD排除出了欧洲PC零售商的销售范围。可以说,AMD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铺开了对英特尔的反垄断指控。

对于AMD的指控,JFTC以英特尔滥用垄断权力,排除公平竞争的行为违反《禁止垄断法》第三条为由,要求其停止该等限制竞争行为。欧盟委员会以英特尔向原始设备制造商提供回扣、使其使用英特尔的CPU,向制造商提供市场资金资助使AMD CPU产品线的推出被取消,在服务器市场上以低价格销售CPU排挤AMD公司这三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为由,要求英特尔停

止该等垄断行为并支付高达 10.6 亿欧元的罚金。美国最高法院则认为由于 AMD 与英特尔的竞争行为基本上发生在海外市场,因而 AMD 必须提供英特尔在本国以外市场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证据。在长达 5 年的谈判和博弈之后,英特尔最终同意向 AMD 支付 12.5 亿美元的赔偿金以了结此案^[5]。

3. 谷歌排挤竞争对手案

2010 年欧洲 Foundem 和 Ciao 公司起诉谷歌,指控其利用在搜索引擎市场的垄断地位,将自己的服务排在搜索结果靠前位置,而将竞争对手的网站放在不显眼的位置。2011 年 3 月微软向欧盟委员会提起了诉讼,指控谷歌滥用其在欧洲搜索引擎市场的垄断地位,进行不公平的竞争,限制包括微软手机软件在内的其他搜索引擎对谷歌旗下 Youtube 网站的访问。同年 6 月法国搜索引擎公司 1plus V 也对谷歌提起了诉讼,指控其利用市场垄断地位阻碍替代服务的发展,要求谷歌支付 2.95 亿欧元的赔偿金。2010 年欧盟委员会宣布对谷歌在搜索引擎市场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展开反垄断调查。谷歌引擎的搜索页面由“非付费搜索结果”和第三方广告(付费业务)组成。欧委会将着力调查谷歌是否通过降低竞争对手网站在垂直搜索系统中的排名,同时将自身的服务排在搜索系统前面的手段限制竞争,并调查谷歌是否强加给其广告合作伙伴排他性交易的义务,如防止这些广告商在自己网站上发布竞争性广告^[6]。

二、科技创新:反垄断法的困惑和挑战

反垄断执法机关对科技巨头的积极执法虽然在短期内遏制了所谓的“垄断势力”增长,但却引起了诸多质疑和讨论。许多人认为反垄断法的干涉是在无情扼杀科技成果。近十年来频频发生的垄断案甚至使人们将反垄断法的价值理念曲解为“均贫富”而遏制了科技创新的动力。

反垄断似乎成为了科技创新的铁腕杀手。这些质疑是不无道理的。首先,在科技巨头垄断案中,竞争对手成为了控诉的主角,这不免引起人们对反垄断法不是在保护竞争,而是在保护竞争者的质疑;其次,法院或执法机关在判决中声称对这些企业进行处罚是为了维护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但消费者的实益似乎并没有受到损害,反而获得的是更为低价和方便的服务;再次,反垄断法的模糊性以及严厉的惩罚性更加剧了科技创新与反垄断法之间的矛盾。

1. 对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扭曲之质疑

从微软、英特尔、谷歌等垄断案件中可以看出,案件的发生基本上都是由于这些企业的竞争对手提起了诉讼,这不禁让人质疑执法机关是迫于这些竞争对手的压力而展开调查。政府倡导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是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当然保护竞争者也是保护竞争的一种途径,但这种方式的运用绝对是应小心谨慎的。在所有的这些信息业大型企业垄断案的处理方式上,政府似乎一边倒地偏向了所谓的弱势企业,这就无法避免人们对于政府是在运用反垄断法这一工具保护竞争者的质疑了。如在美国微软案发生后,就有 240 位经济学专家联名向美国总统发出公开信,在信中指出:反托拉斯法本来是用来规制垄断者‘高价格、低质量’的行为的,但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消费者前所未有地享受着不断降低的价格以及不断提高的质量。一些竞争对手日子越来越难过,便转而向政府寻求行政帮助^[7]。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在实行民主选举制的西方国家,政府利用反垄断的利刃对这些“垄断企业”进行制裁最初是为了阻遏庞大的经济实体对政治的影响及危害。要知道,《谢尔曼法》制定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弱很多行业中结成的托拉斯势力对政府和国会的威胁,防止托拉斯集团操控整个社会。正如经济学家波斯纳所说,为这些法规的制定投下重要一票的立法者们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小企业和特定消费者群体福利的

关心要多于配置效率的关心,特别是因为经济学界本身对反托拉斯政策也没有什么热情^[8]。而像日本、韩国在此类案件中如此积极地执法虽然从正面来看可归于日韩反垄断执法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保护民族科技产业”的质疑。

2. “消费者受损害”之质疑

执法机关和法院在调查和审理微软、英特尔等垄断案的过程中都声称其有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益的目的,但外界的质疑是这些所谓的垄断企业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是否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以及处罚的结果是否给消费者带来了实益。执法机关和法院的最主要理由是这些企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于消费者来说,低价、便捷的服务才是最直接的对消费者有利的。微软将浏览器、多媒体播放软件与视窗操作系统捆绑销售为消费者提供了一条龙式的服务,并且消费者购买产品集合的价格必然是比分别购买单项产品的价格低的。而在英特尔案和谷歌案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其限制竞争的行为并没有降低服务质量或抬高产品价格而使消费者受到损害,而受到直接损害的恰是这些企业的竞争对手。

反垄断执法机关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毫无例外的是处以高额的罚款,然而这些罚款的去向执法机关却难以说明。事实证明,罚款并没有用来补偿所谓的受损害的消费者(事实上消费者是否受损还有待验证),而是成为了政府或执法机关的一笔额外收入,这显然与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的理念是不符的。而且企业在承受了高额的罚款之后,其极有可能会通过市场的途径(抬高价格等)来弥补罚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反而不利于消费者,其中真正受益的只能是这些巨头的竞争对手。

3. 反垄断法模糊性与对科技产品垄断的质疑

虽然反垄断法自产生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不可否认的是涉及到具体规则时还是

具有模糊性。美国在这一百多年里,反垄断法的具体规则不断地在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原则、效果原则与利益平衡原则之间替换,导致许多人对美国反垄断法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9]。这种模糊性使得 IT 巨头垄断案的处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微软案中,2000 年哥伦比亚法院刚判定微软胜诉,2001 年特拉华州的地区法院却裁决微软拆分为视窗操作系统公司和办公室软件公司;英特尔案中,法院、英特尔和 AMD 公司更是经过了多年的博弈也没有形成最终判决,最后以英特尔向 AMD 支付高额赔偿金和解。这其中的一个最大的质疑是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和那些分析家们到底对科技创新产品了解多少。微软的商业行为到底属于捆绑销售还是更好的创新产品组合;对英特尔与制造商之间协议的控诉是 AMD 公司打击竞争对手,争取市场地位的手段还是维护市场竞争的保卫战;所谓的谷歌竞价排名行为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还是小企业竞争不过采取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这些疑问都是反垄断法在短期内无法回答的。

三、科技创新与反垄断法理念及制度的冲突协调

其实,在信息产业领域,那些靠不断地技术创新掌握垄断地位的企业并没有错。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对企业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证。他认为“大”使孰能生巧成为了可能,并通过对作坊式的制针方式和大机器生产模式的比较,凸显了规模经济的效益^[10]。这一论断对于科技创新同样适用。一般而言,创新这项活动是需要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支持的,这样的活动大企业则更为擅长。正如熊彼特所说,推动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内在动力在于创新,而大企业最可能创新,因为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是小企业无力负担的^[11]。他还认为,从长远看垄断是比完全竞争更有效率的,因

为其更利于创新。那么 IT 业大企业频频受到制裁是否意味着反垄断法遏制了创新的动力呢?

事实上,科技创新与反垄断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科技创新拓宽了个体自由的界限,反垄断法则是要保障自由平等地竞争,两者在价值理念上是有一定联系的。之所以造成反垄断法遏制科技发展步伐的表象,是因为在近十年发生的相关案件中,反垄断法指向所谓的限制竞争行为的同时,也指向了科技创新产品;同时高额罚款甚至拆分企业这类严厉的措施又令人质疑反垄断法拖延了科技进步的步伐,使竞争者获益。因而,笔者认为在未来处理类似案件过程中,减少科技创新与反垄断法冲突质疑的措施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应该始终是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

一般认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主要有维护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益、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几个方面^[12],视各国经济、政治等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侧重。然而,考察近几年 IT 行业垄断案的处理结果,似乎都与这些价值目标有所偏离,尤其是维护竞争和保护消费者两个方面(前文已有论述)。笔者认为,无论处理何种类型的垄断案件,反垄断法维护竞争和保护消费者的基本理念是不应受到动摇的。首先,在案件的受理、调查和审理过程中,执法机关和法院应始终以反垄断法的理念和具体规则为依据,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而不应被大企业竞争对手频繁的控诉或游说政策所影响。其次,对企业的罚款应当经过更加合理的经济分析,而不宜处以过高的惩罚性赔偿;同时对罚款也应进行合理的管理,使这笔资金也能最终回馈于消费者或市场本身,而不是直接进入政府或竞争对手的腰包。

2. 本身违法原则向合理原则的转变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史上,立法者和执法者都曾经一度相信诸如“限定价格”、“横向分割市场”、“限制交易”和“捆绑销售”等行为是肯定限制贸易和企图垄断的行为,而因适用“本身违法

原则”来加以判定。但是,近年来出现的科技产业专利权、著作权以及技术标准垄断案却给这一原则的适用带来了很大挑战。以捆绑行为为例,在美国反垄断法实施早期,捆绑行为是按本身违法原则来处理的。当时法院认为这种商业行为除了压制竞争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目的。然而科技的发展使这种论断变得软弱无力。在“美国诉微软案”中,特拉华州的地区法院法官杰克逊曾认为微软的捆绑销售行为本身违反《谢尔曼法》而判定将其拆分为两个公司。而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却推翻了杰克逊法官的判决,认为不应对操作系统和网络浏览器的捆绑安排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该法院认为涉及计算机软件的捆绑销售也可能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而且软件捆绑即使对不具有市场支配能力的企业而言也是很常见的现象^[13]。在本次审判中,法院首次采用了“杰斐逊·帕丽斯测试”法来判断一项捆绑销售行为是否包含两种以上产品。另外,虽然在某些限制交易和分割市场行为中,法院仍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是否适用却应通过理性原则来判断。如在英特尔案和谷歌案中,法院分别要求提起诉讼的竞争对手应首先提供英特尔公司在海外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证据,以及谷歌操纵搜索结果排名的证据。

3. 在救济制度中慎用剥离措施

对于大企业的垄断行为,法院或执法机关惯用的救济措施就是对大企业进行拆分,或进行资产或业务的剥离。但在面对科技行业大企业垄断案时,则须谨慎运用剥离措施。实际上,一方面,剥离措施仅是简单地对企业进行了结构调整,表面上减弱了垄断势力,但实则不然。当年微软若是被拆分为视窗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两家公司,其在操作系统市场的份额仍高达 85%,而在办公应用软件市场的份额则高达 90%,并未实质性影响其垄断地位。而另一方面,剥离措施很有可能将本来有效率又广受欢迎的科技产品组合人为分拆开来,从而降低了产品生产及被运用的效率,也不易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就

有悖反垄断法的基本理念了。而在 2011 年美国司法部最新修订法的《合并救济指南》中也说明了当救济措施涉及专利等无形资产时,转售或许可能是比绝对剥离更好的方式^[14]。虽然这是合并救济的方式,但也可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垄断案件。

四、启示:我国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应保护科技创新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一般都伴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相信 2008 年经济危机后,不久的将来亦将会引发一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生产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要抓住下一次科技革命的机遇,首先应在制度上有所突破,而其中法律制度则是重要的一方面。正如经济学家诺思所说,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15]。近 3 年来,中国在反垄断法立法和执法上的积极探索就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姿态。然而,在处理科技创新与反垄断法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目前仍是不足的。对中国来说,反垄断法如何保护科技创新的成果可能是比如何缓解与科技创新的矛盾更为重要的问题。虽然这几年来,在建立“创新型国家”等政策的鼓励下,中国涌现了一大批掌握先进科技成果的企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基本上都是国外的大企业垄断着专利权甚至技术标准。

面对国外大企业可能存在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中国反垄断法的应对显然是软弱无力的。我国只在《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中规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适用《反垄断法》,而更具体的规定却至今仍未制定。这也是中国《反垄断法》颁布以后,反垄断执法机关对英特尔案、谷歌案等仍未有发言权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应对国际性的滥用知识产权案件,保护本土的科技创新成果,可在反垄断法的立法和执

法上做以下两方面的努力。

1. 制定与知识产权反垄断有关的单行法规

目前在知识产权反垄断方面的规定除了《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外,没有其他具体的规定加以支撑,这为反垄断执法带来了难题。事实上,通过制定与知识产权反垄断有关的单行法规或指南在国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如 1995 年美国司法部制定了《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指南》,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的分析方法,并对适用本身违法和合理原则的情况做了说明;1996 年欧盟颁布了《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同体条约第 81 条第 3 款的 240/96 号条例》,明确区分了合法与非法的限制竞争条款,并规定了技术转让协议适用豁免条款的条件^[16]等。

从中国目前的反垄断立法模式看,以《反垄断法》规定总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单行法规是比较好的立法模式。在与知识产权反垄断有关的法规中,应当明确对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行为种类进行界定,规定每一种行为的分析方法,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或合理原则的情形,以及域外适用的情况。在制定具体条款时,可参照现已实施的工商局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和商务部《关于评估竞争者集中竞争影响暂行规定》中的相关市场分析部分,这些都为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提供了有效依据。

2. 加强知识产权反垄断的区域与国际合作

在谈及如何应对跨国企业滥用知识产权问题时,解决途径一般倾向于在立法和执法上加强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然而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首先,反垄断法域外效力的强弱实际上与一国的综合实力有关。强者如美国,其反托拉斯法的域外效力是诸多跨国企业都应小心对待的,而基本上那些科技巨头不会对一个小国家的反垄断法买账。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使得滥用知识产权日渐成为一个国际性垄断问题,本国反垄断法的对外适用易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因而笔者认为除了在与知识产权反垄断有关的法规中规定域外效力外,还应在执法层面加强区域与国际间的合作,以缓解域外适用易造成的冲突。当今世界,在专利、商标、技术标准等科技成果方面享有专有权的一般是那些国际性的

大企业,如果存在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现象,这些行为往往也具有国际性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在反垄断执法上加强合作,并着力形成一套统一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示范文本,如此对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规制才更为有效。

参 考 文 献

- [1]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EB/OL]. [2011-08-27].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f200400/200457.pdf>.
- [2]Commission Concludes on Microsoft Investigation, Imposes Conduct Remedies and A Fine [EB/OL]. [2011-08-27]. EU Commission: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4/382&format=HTML&aged=1&language=EN&guiLanguage=en>.
- [3]TOSHIKI TAKIGAW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 S, EU, and Japanese Microsoft Cases [M]. The Antitrust Bulletin (2005), Vo. l50, No. 2: 250-264.
- [4]JIN KIM.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s; Decision on Microsoft s' Tying Practice; The Second - Best Remedy for Harm Competitors [M].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2007), 16(2): 385.
- [5]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l Corporation V.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EB/OL]. [2011-08-28]. http://www.instituteforlegalreform.com/get_ilr_doc.php?id=733
- [6]Commission probes allegations of antitrust violations by Google [EB/OL]. [2011-08-28]. EU Commission: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10/1624&format=HTML&age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 [7]王中美. 反垄断法与科技创新:以微软案为例[EB/OL]. [2011-08-29]. 国际经济法网: http://ielaw.uibe.edu.cn/html/wenku/guojijingjifa/guojifanlongduanfa/20080417/679_5.html
- [8](美)理查德·A·波斯纳. 反托拉斯法[M]. 孙秋宁,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9.
- [9]王天习. 论美国反垄断法“模糊性”的三大表现:从微软垄断案说起[J]. 法学评论,2002(1):106-114.
- [10](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M]. 郭大力,王亚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3-9.
- [11](奥地利)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上海:商务印书出版社,1999:151-177.
- [12]丁茂中,徐士英. 反垄断法宗旨研究[J]. 经济法论丛,2008(上卷):59-80.
- [13]薛兆丰. 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6.
- [14]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 [EB/OL]. [2011-08-30].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72350.pdf>.
- [15](美)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
- [16]王晓晔. 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法律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4):130-144.